

從明人文集論明代臺閣體之真相

[臺灣]簡錦松*

目 录

1. 前言
2. 臺閣體應正名為館閣體
 - 1) 臺閣體的指謂與誤解
 - 2) 從館閣詞林到館閣之體的指謂
3. 館閣詞林內聚力與臺閣體形成
 - 1) 館閣詞林內聚力之產生
 - 2) 文集中所反映的館閣詞林內聚力
4. 李夢陽崛起的真正改變與臺閣體傳承之變局
 - 1) 與館閣詞林體貌迥殊的李夢陽一派的文章新樣
 - 2) 由明代文集所見李夢陽以後館閣內外力量之消長
5. 結論

1. 前言

昔人談論明代文學，往往以所謂「三楊臺閣體」，與「李東陽（1447-1516）茶陵派」、「李夢陽（1472-1529）七子派」對比。此說自錢基博《明文學史》、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起，歷久不衰。如1996年版《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所說：

明代的臺閣體可以三楊為標誌，他們以宰輔的高位領袖文壇近四十年之久。¹⁾

* 台灣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1) 袁震宇、劉明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明代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0-73頁。

認為臺閣體乃是由三楊所領導的文體，同書第 81頁談到吳寬（1435-1504）時說：「未脫館閣之習」，又第85頁談到李東陽時也說：「這些議論儼然是臺閣諸家的話了」，並且說：「他（李東陽）自己在《南行稿》、《北上錄》二集中，描寫了數千里返鄉途中的見聞，較之臺閣諸公在題材方面開闊多了，也有一定的真實感。」這些言論，都是把本為臺閣體領袖的吳寬、李東陽，劃出臺閣體之外。

其實，吳寬也好，李東陽也好，與楊士奇同樣都是館閣詞林的領袖，正宗的臺閣體代表人物，不可分割為二。更何況李東陽的《南行稿》本是受到楊士奇〈南歸紀行錄〉的影響，²⁾如單以題材的開闊與內容的寫實性而論，李也未必勝楊。為什麼這些明代文學研究者會忽略這層關係？主要的原因，就是根本誤解了「臺閣體」。

我在1987年撰寫《明代文學批評研究》一書時，即已注意到「臺閣體」被誤解的問題，我首度提出「臺閣體者，乃館閣人之詩文體」的說法，並首次以明代文官制度去闡釋「臺閣體」。³⁾我從大量的明人文集、歷朝實錄、典章載籍入手，研發了一套以制度為經、人物事跡為緯的方法，去追蹤館閣詞林，利用它解釋了一些臺閣體的關鍵問題。其後，廖可斌、陳廣宏等人都注意到這個問題，⁴⁾2010年陳文新、郭皓政〈從狀元文風看明代臺閣體的興衰演變〉⁵⁾ 2011年葉曄《明代中央文官制度與文學》⁶⁾，所論亦精采可觀。

本文除繼承原有的工作之外，實際比對了八百餘種明人文集，深入觀察館閣詞林如何在制度因素下產生內聚力量，而形成臺閣體這種獨特的文學集體，並以李夢陽的崛起為對比，解釋臺閣體的傳續及其與復古派之爭的意義。

全文分為兩部分，首先，我利用明人文集的記載，從文官制度的層面解釋「臺」、「館閣」、「翰林」、「詞林」等名詞，指出「臺閣體」應正名為「館閣體」，以符合明代中央文壇現況。而後，再以統計法解析館閣大家的文集，指出館閣詞

2) 楊士奇，《東里全集·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49-50卷全部。

3)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第19-83頁。

4) 關於此，廖可斌著有《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年。又，註6之葉曄即陳廣宏指導的博士生。

5) 見《文學遺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2010年第6期。

6) 葉曄，《明代中央文官制度與文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

林如何經由獨特的內聚力，形構出特殊的文學集體風習，「館閣體」並非只是人物的官銜區分，乃是在這種文官制度下，實際形成了集團性的特殊文體。第二部份，我從實際的文章作法差異，說明李夢陽崛起之後何以會對館閣詞林發生強大的衝擊力；又由館閣內部所遭遇的政治變化，指出李夢陽從一個非詞林的文人成為文學宗師的原因，並藉著分析《明史·藝文志》⁷⁾所收錄明人文集的出版情形，解析館閣體在李夢陽崛起後，在明代文壇上的後續表現。比較可惜的是，當以實際的文章來討論李夢陽與館閣詞林的作法差異時，本來應該詳述館閣推崇歐陽修所形成的文風特徵，因為本文字數太多，不得已割愛了。⁸⁾

2. 臺閣體應正名為館閣體

1) 臺閣體的指謂與誤解

明人文集中甚少用「臺閣」及「臺閣體」，而多用「館閣」及「館閣之體」。如顧璘稱謝鐸（1449-1531）文章為「憲孝二廟館閣之望」，⁹⁾倪謙也被李夢陽推崇為「卓然館閣之體，非巖棲穴處者所能到也」，這類例子，俯拾即是。¹⁰⁾「臺閣」與「館閣」的意涵不同，稱「臺閣」是淵源於典故的用典手法，是美譽，是尊稱，也是虛稱；稱「館閣」才是符合明代官制的實在稱謂。若要正確解釋明代文學史，最好把這個發生於「館閣」的文學現象，正名為「館閣體」。

7)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8) 關於此，本文初稿原以一個完整的小節，從明代文集的現象深入解說，但因字數超過規定太多，只得將來再另外投稿。不過，我在《明代文學批評研究》第二章，第39-48頁，〈臺閣體與歐陽修〉節，曾經提出了這個觀點，請參考。

9) 謝鐸由天順八年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修，進侍講學士，弘治末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管國子祭酒事，見李東陽著，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文後稿》，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卷3，第44頁，〈壽方石先生七十詩序〉。及顧璘，《息園存稿·文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卷1，第1頁，〈謝文肅公集序〉。

10) 見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前稿》，卷9，第128頁，〈倪文禧公集序〉。

對「臺閣體」一詞所下的定義，以明人張慎言〈何文毅（宗彥）公全集序〉所言最為適切：

當代名相之業，莫著於楚石首楊文定（士奇），值締建之初，補天浴日，策勳亡兩。於是文章尚宋廬陵氏，號臺閣體，與世嚮風。其後權散而不收，學士大夫各挾其所長，奔命辭苑。至長沙李文正出，倡明其學，權復歸於臺閣。……臺閣之文，實我公再造也。¹¹⁾

文中指出楊士奇、李東陽相繼為臺閣體的先後領袖，極為正確。王世貞也說：「文章之最達者，則無過宋文憲濂、楊文貞士奇、李文正東陽、王文成守仁。楊尚法，源出歐陽氏，……至今貴之曰：臺閣體。」¹²⁾又說：「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導流。」東里即楊士奇，長沙即李東陽，其說法與張慎言相同。從「闢源導流」之說，即可以證明王世貞眼中的「臺閣體」如江河之源與流，乃先後傳承的公器，不是一二人的私稱。此外，他雖然推重王守仁，並沒有把他納入臺閣體，因為王守仁並非館閣出身。

近人的誤解，多出於誤讀錢謙益之書。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楊士奇》說：「國初相業稱三楊，公為之首，其詩文號臺閣體。」¹³⁾近人不察，遂以為臺閣體就是專指楊士奇或三楊。其實，錢謙益固然在這裡指出楊士奇為臺閣體，同樣的，他還三次分別提到宋濂、李東陽、吳寬也是臺閣體，¹⁴⁾所以，把「臺

11) 見黃宗羲，《明文海》，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253，第10頁上。

12) 見王世貞，《藝苑卮言》，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卷5，第1024頁。

13) 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乙集，第162頁，〈楊士奇小傳〉。

14) 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第269頁，〈石熊峰等六人小傳前〉：「成弘之間，長沙李文正公繼金華、廬陵之後，雍容臺閣，執化權，操文柄，弘獎風流，長養善類。」同書，第274頁，〈吳寬小傳〉：「匏庵者，先生之自號，亦以老居臺閣，不得大用，蓋用以自寓云。」，同書，頁549，〈馮琦小傳〉：「自時厥後，詞林……以牛鬼蛇神自喜，東里、西涯，前輩臺閣之體，於是乎漸滅殆盡。」錢氏在談到臺閣的時候，帶著崇敬羨慕的語氣，但不論他在介紹石邦彥等六人也好，在談論馮琦也好，實際所談的都是「館選」、「詞林之學」、「吾於近代館閣之文」這些事，而且，「前輩臺閣之體」的前輩二字，也是就館閣的輩份來說的，這就是我所說的，若要落實到真正的現實面，就須使用「館閣」一詞，去注意這個實際的機構，以及在這個機構圈內的文學活動。

閣體」局限在楊士奇或三楊，是誤解了錢謙益的語意。

而且，正如其他明人文集極少使用「臺閣」及「臺閣體」這樣的名詞，多以較為務實的「館閣」與「館閣體」來敘述，錢謙益也不例外。錢謙益《初學集》中凡九次出現「館閣」或「館閣體」的稱呼，《有學集》中也有十次使用了「館閣」或「館閣體」，¹⁵⁾至於「臺閣」一詞，只在《有學集》中兩度使用，都是用來稱贊梁慎可的，說他「世食舊德，胚胎前光，漢世稱公卿子孫，諳曉臺閣故事者，於當世無兩。」¹⁶⁾很明顯地是使用了典故手法。甚至如《列朝詩集·吳寬小傳》中，錢謙益順著李東陽的話頭，稱吳寬為「老居臺閣」，而到了〈范長倩石公集序〉則說：

昔在休明之世，吾吳徐武功、吳文定、王文格諸公，以館閣鉅公，操文章之柄，一時名賢輩出……。¹⁷⁾

吳文定即吳寬，他在這裡把吳寬回歸到「館閣鉅公」的稱呼，而曾入內閣的徐有貞（徐武功，1407 - 1472）、王鏊（王文格，1450-1524），也一併被加以館閣的原稱。

- 15) 見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又見錢謙益，《有學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牧齋初學集》中，如卷30，第899頁〈趙文毅公集序〉、卷31，第913頁〈孫紫冶詩稿序〉、卷33，第949頁〈張異度文集序〉、卷33，第956頁〈林太史玉署初編序〉、卷36，第1006頁〈李本寧先生七十敘〉、卷37，第1041頁〈嘉禾黃君五十序〉、卷40，第1086頁〈孫子長詩引〉、卷51，第1297頁〈李公維楨墓誌銘〉、卷63，第1486頁〈翰林院學士蕭公神道碑〉。《有學集》中，如卷16，第5頁上，總第140頁〈成文穆公全集序〉、卷16，第9頁上，總第142頁〈董文敏公文集序〉、卷17，第15頁上，總第156頁〈申比部詩序〉、卷18，第13頁下，總第166頁〈范長倩石公集序〉、卷32，第7頁下，總第316頁〈李貫之先生墓誌銘〉、卷26，第3頁下，總第251頁〈黃氏千頃齋藏書記〉、卷28，第1頁上，總第267頁〈吏部尚書謚文瑞劉公一景墓誌銘〉、卷32，第16頁下，總第319頁〈處士楊君無補墓誌銘〉、卷32，第7頁上，總第316頁〈李貫之先生墓誌銘〉、卷49，第11頁上，總第476頁。都是以「館閣」和「館閣體」來稱呼館閣詞林的活動及其文體。
- 16) 見錢謙益，《有學集》，卷14，第10頁下，總第118頁，〈玉劍尊聞序〉。錢謙益稱贊梁慎可所撰《玉劍尊聞》及《內閣小識》二書，都說：「慎可名臣子孫，如漢之黃瓊，習知臺閣故事。」另一篇即〈內閣小識序〉，見同書，同卷，第15頁上，總第121頁。
- 17) 見錢謙益，《有學集》，卷18，第13頁下，總第166頁，〈范長倩石公集序〉。

換言之，楊士奇雖然最早被人美為「臺閣體」，但它所代表的並不只是楊士奇個人的文體，而是包含他身後所存在的館閣詞林的共有文體，「臺閣體」的美稱也一代一代的，一直不斷地投射到歷任館閣詞林領袖身上，「臺閣體」也就變成了公用名器，而非某一人的代名。前舉張慎言〈何文毅（宗彥）公全集序〉，前後歷數了楊士奇、李東陽、何宗彥，都稱為臺閣文章領袖，以後錢謙益也繼承了臺閣領袖的傳統，¹⁸⁾都反映了此一事實。

在明代文集中，「臺閣」與「館閣」二詞並不完全相同。「臺閣」，是基於用典手法，對中央政府高層的美稱，帶有羨慕、增美、自炫的語意。如稱楊士奇、李東陽為「臺閣之體」，是館閣後輩對前輩的美談，如張慎言、何宗彥等人自居於「臺閣體」，是想誇示館閣文柄的文壇影響力。反之，「館閣詞林」是明代官制下一個實際存在的文官體系，「館閣體」是在這個體系內的眾人，共同趨向的一個實存的文體，「館閣體」比「臺閣體」一詞更能夠真實反應明代文壇結構的實況，其原因在此。

「臺閣」一詞的用例，請先看王樵〈與趙陽谿書〉：

本朝先輩……其在臺閣而有勳名者，則李文達公（賢）、于肅愷公（肅）、王端毅公（恕）、胡端敏公（世寧），要是孔門正脈，故某區區信向者，惟此數公。¹⁹⁾

王樵（1521-1599）曾任刑部員外郎、尚寶卿、右都御史等職，著有《大明律解》等書。尚寶卿的職務與翰林院有些關聯，是非常接近館閣的職位，他有〈符臺記〉一文論及內閣公座問題。對於館閣文體，他也曾說：「明興先正，館閣為

18) 錢謙益本人就是出身翰林院的館閣中人，明亡前曾任禮部侍郎，若非甲申國亡，他也可能入閣，而成為新一代的館閣領袖。因此，以他的身分、履歷與文學知名度而言，他把自己視為館閣的代言人，完全不足為奇。他推崇李東陽，攻擊前後七子，除了文學主張上的原因之外，也可以說是從館閣詞林的立場，才發展出這樣的見解。錢謙益在〈孫承宗行狀〉後自署名為「門生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史官」見《牧齋初學集》，卷47，第1160-1238頁，孫承恩被誣而沒，此文志在辨誣，自書前史官之意或在此，但他喜歡自稱史官，在《初學集》、《有學集》二書中屢見之，其實這就是他對自己館閣身份的自覺與矜重的明證。

19) 王樵，《方麓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8，第33頁下。

宗，典則為佳。」²⁰特別是，其仲男王肯堂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到三年散館、留授檢討之前的那段期間，父子間曾有二十一封家書往來。²¹由這些履歷及信件，可說明他對當代官制及中央文壇運作，並不陌生。他所指出的四位「在臺閣」者，除李賢（1408-1466）曾入閣、王恕（1416-1508）未入閣但曾選入庶吉士外，其餘二人都與翰林院無任何關係，也不曾入閣。四人相同之處，乃是皆曾任為六部尚書。²²由此可證，「館閣」之人雖然可被人尊稱為「臺閣」，而「臺閣」並不限「館閣」之人。

明人使用「臺閣」一詞，帶有濃厚的用典性質。自從西漢以「臺閣近臣」，指在皇帝身邊的官僚，至《晉書》劉超、石勒等傳，則稱中央政府初建，布列百官，為「臺閣初建」。唐時居相位、職為列曹侍郎者，都可稱為「在臺閣」，見《舊唐書》蘇味道、于敖、張弘靖等傳。²³《大唐新語》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²⁴二人即房玄齡、杜如晦，房為尚書左僕射，杜為尚書右僕射。到了北宋，由於館閣制度的雛形已具，也有拿「臺閣」一詞稱館閣學士的例子，如惠洪的《石門文字禪》即不止一次用到。²⁵由此種種觀之，「臺閣」作為中央

20) 王樵，《方麓集》，卷12，第20頁下，〈祭王鳳州文〉，此文作於萬曆十九年。

21) 王樵，《方麓集》，卷9，第30頁下，〈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則〉，三十五封信中，二十一封是其子在館期間寫的，對庶吉士的閣試及散館留任翰林院諸事，有深刻的見解，保存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細節。

22) 李賢入閣時由禮部侍郎兼學士，旋晉吏部尚書，王恕為正統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大理評事，最終的職務為吏部尚書。胡世寧（1469-1530），弘治六年進士，初授湖廣德安府推官，最後官職為兵部尚書。于謙（1398-1457）永樂十九年進士，曾為御史，最後亦為兵部尚書。

23) 以上臺閣詞彙用例，係搜檢自中央研究院的《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網頁，網址：<http://hanchi.ihp.sinica.edu.tw>。

24) 劉肅著，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1，第3頁。

25) 北宋已有館閣制度的早期雛形，參見陳騏著，張富祥點校，《南宋館閣錄》，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宋〕惠洪：，《石門文字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5，第12頁下，〈會游侯伯壽思儒之間久矣，而未識季長，昨日見之〉，云：「君看氣焰遮縉紳，想見精神映臺閣。……且置袖中批誥手。」，又，同書卷3，第9頁上，有〈喜會李公弱〉詩云：「君才合在臺閣間，簿書堆中不應有。且置玉堂風雨筆，來試牛刀霹靂手。」由玉堂、批誥等語，可知他所說的臺閣，是指館閣學士，如蘇軾曾

政府高官的古典代稱，由來已久。

我再舉一個有趣的例子，可以看出充滿典故性質的「臺閣」與出自實際官制的「館閣」二詞之間的差異，李東陽〈書杏園雅集圖卷後〉一文中說：

杏園雅集圖一卷，乃正統初「館閣諸老」西楊公而下九人，會於東楊公之第。……且自洪武之開創，永樂之戡定，宣德之休養生息，以至於正統之時，天下富庶，民安而吏稱。「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職，乃能從容張弛，而不陷於流連怠放之地，何其盛也。²⁶⁾

這是對一個古圖卷的跋後，參加杏園之會的人員，有楊士奇、楊榮、楊溥、王英、王直等，都是翰林出身，所以說是「館閣諸老」，這是實際的官制；等到行文至「廟堂臺閣之臣，各得其職」時，是指包含了館閣諸老以及諸老以外的中央政府官員的綜合之稱，這時候的「廟堂臺閣之臣」之語，就是用典手法。

另外，李東陽〈匏翁家藏集序〉一文也可參證，他說：

（吳寬）及為部使所迫，取甲科，官史局，文名滿天下，老居臺閣，弗究厥施，而始終於所謂文者。²⁷⁾

以吳寬（1435-1504）的履歷來說，他出身翰林，長期掌詹事府，又兼翰林學士，入內閣知制誥，最後任吏部侍郎、禮部尚書。須注意此所謂「內閣知制誥」，仍是翰林學士之職，與入內閣為輔臣並不相同，他一生未並入閣，所以《明史·宰輔年表》未列入他²⁸⁾，《國朝獻徵錄》將他的墓碑排列在「詹事府」類之下，王鏊寫他的神道碑時，所記官銜為「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並歎息他未能入閣。²⁹⁾未入內閣的吳寬，被內閣首席的李東陽稱為「老居臺閣」，正是以典故手法，將「臺閣」一詞用在未入內閣的館閣詞林高層。

任翰林學士知制誥之類。

26) 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後稿》，卷10，第196頁。

27) 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後稿》，卷3，第58頁。

28) 見《明史》，卷109，第3305-3393頁，〈宰輔年表〉。

29) 見王鏊，《震澤集》，卷22，頁1，〈吳公寬神道碑〉。

2) 從館閣詞林到館閣之體的指謂

如上所述,「臺閣」乃是出於用典的美稱,實際上,明代「臺」、「省」、「館閣」的定義非常分明,以下簡單說明這三個名詞的所指。「臺」專指御史臺,後改稱都察院。³⁰⁾費宏〈謝公遷神道碑〉云:「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為文以賀,峻拒之,眾遂知公正直不可妄干矣。」³¹⁾「臺中」即都察院辦公室。所謂「省」,乃指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若不計入各部尚書侍郎這一層級的話;「省」又可稱「郎署」。李東陽〈送都御史陳公之南京詩序〉云:「今兩京臺省,聯翩而進,一歲之內,遞至數人。而為官之長者,合而計之,蓋十有餘人矣。」³²⁾〈送張兵部還南京詩序〉云:「今仕兩京為列卿,不過十三人。」³³⁾兩篇文章為同時之作,受文者都是他的甲申同年,所指十餘人,乃是同一群人。當受文者官職為「都御史」時,即稱「兩京臺省」,兼及臺和省;當受文者為「兵部」官員,則稱「仕兩京為列卿」,側重省這一邊。由於「臺」與「省」都是經由吏部詮敘,所以習慣上合稱「臺省」,與「館閣」相對。³⁴⁾

明代的「館閣」實指是什麼?何以又稱「詞林」?為什麼它的地位特別重要?

「館閣」的所指,任職翰林編修的羅玘(1447-1519)在〈館閣壽詩序〉一文中,有很具體的說法:

今言館,合翰林、詹事、春坊、司經局皆館也,非必謂史館也;今言閣,東閣也,凡館之官,晨必會於斯,故亦曰閣也,非必謂內閣也。然內閣之官亦必由館閣入,故人亦蒙冒概目之曰館閣云。有大制作,曰:「此館閣筆

30) 見徐學聚,《國朝典彙》,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卷53,第925-926頁。

31) 見焦竑,《國朝獻徵錄》,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卷14,第47頁上,總第109-475頁。

32) 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後稿》,卷2,第30頁。

33) 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後稿》,卷2,第15頁。

34) 如王鏊在〈丙辰會試錄後序〉所說:「……進士為重,至我朝又加重焉,館閣之選於是焉取之,臺省寺院於是焉取之,方岳郡縣於是焉取之,不由是者,不謂之正途。」文中談的是實際任官,故以「館閣」與「臺省寺院」、「方岳郡縣」對舉。見王鏊,《震澤集》,卷11,第1頁上。總第414-314頁。

也，有欲記其亭臺，銘其器物者，必之館閣，有欲薦道其先功德者，必之館閣。³⁵⁾

羅氏指出所謂館，包含了史館（翰林院）³⁶⁾，以及太子的輔導之臣（詹事、春坊、司經局）³⁷⁾。所謂閣，並不是內閣，而是指東閣，因翰林及東宮官員晨會時在東閣會合排班，故有此稱。羅氏又說，因為「內閣之官」的產生，必須由「館閣」出身，所以一般人都對內閣之官和館閣詞林無差別的稱呼。

在我所經眼的明人文集中，凡說到「館閣」時，都把閣臣算了進來，早先如楊士奇〈王進墓誌銘〉所言：「翰林侍講王進汝嘉卒，館閣自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³⁸⁾吳寬〈跋楊文貞公題贈泰和吳令墨梅詩後〉也說：「楊文貞公居館閣時，實秉相權。」³⁹⁾在吳寬的語境中，楊士奇為閣臣時的身分仍是「居館閣」。

其他如：初入「館閣」稱為「入史館」，人在「館閣」，就稱為「館閣詞林」，或單稱「詞林」或「翰林」，都是明人文集中常見的稱謂。「詞林」一名的出處，是因為洪武時翰林院初建於南京皇城內，其扁額即為「詞林」二字，此後就成為常用名稱。至於以「翰林」代稱「館閣」，是省略了翰林院的院字，使用者也極多，如李東陽〈葉文莊公集序〉云：「今論者無問可不可，文必歸之翰林。」⁴⁰⁾便是此例。

總之，「館閣詞林」就是曾入翰林院體系儲養的官員們所形成的特殊的小集團，「館閣體」便是館閣詞林的文體。「館閣體」乃是在明代文官制度下，由作者

35) 羅玘，《圭峰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第9頁下。

36) 明代北京皇城的東閣之右，有史館十所，收藏列朝實錄、古今書史等，即史館所在，見黃佐，《翰林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史館與翰林院等於是同義詞，如吳寬：〈書壬辰科進士題名後〉，《匏翁家藏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48，第3頁上，云：「設在高等，待罪史館」。

37) 詹事府的詹事、左右春坊、司經局是輔導皇太子讀書的，這四個辦公室的印信例皆由內閣委掌，而寄之於翰林，所有成員皆由翰林院官選授，因此可以收在館閣概念下。參見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後稿》，卷10，第157頁〈答喬希大書〉。

38) 見楊士奇，《東里文集》，卷18，第18頁上。

39) 見吳寬，《匏翁家藏集》，卷51，第09頁上。

40) 見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前稿》，卷8，第110頁。

的身份來定體，而不是以作品的內容表現來定體，至於館閣文體常有共同的趨尚，特別是趨尚於歐陽修，是屬館閣內部的風習。

3. 館閣詞林內聚力與臺閣體形成

1) 館閣詞林內聚力之產生

「館閣詞林」何以形成獨特的文學集團，或者說「臺閣體」何以形成，乃與其特殊的內聚性有關；而其內聚性的由來，又與其獨立升遷的特殊制度有關。

明代翰林院首建之後，即授朱升為翰林侍講學士，當時明太祖就在制書上說了：「備顧問於內庭，參密命於翰苑。」⁴¹⁾永樂以後，翰林院更成為內閣人才的培養所。黃佐《翰林記·御製誥詞》曾說：

嘗考翰林之名，……至我朝而任益崇，凡議禮、制度、考文之大柄，一以付之。論道經邦之輔，由此其選。而政之樞要，史之權衡，皆所綜焉。⁴²⁾

黃佐此言，簡而賅備。

館閣詞林不但所處崇高，還有一項非常特殊的制度，就是它的升遷完全獨立於吏部的銓敘之外，前書《翰林記》的〈遷轉〉條下云：

聖祖定本院官為近侍清貴之職，凡遷轉皆出自上裁，未嘗付諸詮衡，百餘年來遵之不易。⁴³⁾

這是相當優越的禮遇，除翰林院外，與翰林院合稱館閣的詹事府（詹事、春坊、司經局），其官員也是由翰林院選充的，也同在禮遇之中。由於不受吏部

41) 見焦竑，《國朝獻徵錄》，卷20，總第109-816頁，朱禮侍，〈朱侍講學士升傳〉。

42) 見黃佐，《翰林記》，卷1，第8頁下。黃佐為正德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少詹事。

43) 黃佐，《翰林記》，卷5，第3頁下。

銓敘，他們從養成教育（翰林庶吉士），到初階翰林官職（翰林院檢討、編修、修撰），到中階的職務（翰林院侍講、侍讀、翰林學士等），旁及詹事府（詹事、春坊、司經局），一直到最高層（進入內閣為輔臣），都是在翰林院和詹事府中升遷或輪調，自成系統，不與臺省、郡縣官相雜。除了養成教育的庶吉士階段，在散館時還有一次篩選外放的可能外，正式任職翰林院以後，除非特別的變故，不會離開館閣而外放臺省或郡縣。至於館閣高層在入閣前，會先被授予任禮部及吏部的侍郎、尚書等官，仍帶翰林院的職銜。

館閣詞林最受人仰羨的，就因它是內閣的培養所，所謂「內閣之官亦必由館閣入」、「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⁴⁴⁾關於此事，永樂時內閣建置之初，閣臣解縉、胡用之、黃淮、胡廣、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都是現職的翰林院官，⁴⁵⁾其後，內閣諸大學士須由翰林選充，即成常例。如前所述，通常是先被任命為禮、吏二部的侍郎、尚書，然後入閣為輔臣。嘉靖時，世宗皇帝想特別擢用沒有翰林院經歷的張璁為閣臣，也得先安排他入翰林院；乃將陳束、唐順之等十一人，一起由科道部屬選充翰林，此舉並非常有。天啟、崇禎之世，部份閣臣沒有翰林院經歷，那是與明亡前的政局混亂有關，亦非常例。《明代內閣政治》一書曾對《明史·宰輔年表》所列閣臣作了出身調查，⁴⁶⁾指出163位閣臣中，初授官職有翰林院經歷者126人，佔總數百分比77.3%。⁴⁷⁾

館閣詞林的日常職業，也與臺省或郡縣官員大不相同。明代官員主要的進身管道是科舉，進士出身者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也對讀書有興趣。但是，科舉

44) 二語俱見張廷玉，《明史》，46卷，第1702頁，〈選舉志〉。前者在羅玘〈館閣壽詩序〉已有是語，後者見於張時徹，《芝園外集》，台南縣，莊嚴文化出版社，1997年，卷33，第7頁上，總第82-800頁，有云：「自分宜用而始亂紀綱矣，至謂非翰林不入內閣。」

45) 參見楊士奇，《東里全集·文集》，卷20，第17頁，〈金幼孜墓志銘〉。

46) 見譚天星，《明代內閣政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91-196頁，〈明代閣臣初官出身分類表〉。譚表未包括初授非翰林，中間入翰林而入閣，如李賢、張璁者，因此，實際的比率還會更高。

47) 李賢，初授吏部驗封主事，見李賢，《古穰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8，第12頁上，〈故妻贈夫人黃氏墓誌銘〉。

時文與古文詞的差距不小，一般人在未考取進士前，專心舉業，無暇兼顧古文詞。當考取了進士，開始實習，進入新職，又因為職官的工作忙碌，更無暇再讀書作文。相對的，館閣詞林以讀中祕書與作古文詞為職業，翰林院乃是當時全國仰望的古文詞專業之所。即使院內尚未授官的庶吉士，平時有翰林學士主教，每一個半月還有閣試考校詩古文，考試成績將會影響到散館時的分發，決定他們是否可以留在翰林院或外放科道，因而館內的學習競爭非常激烈，更是以讀書為專業。

在官場倫理上，翰林院也有別於其他官署。這裡的管理觀念，是師弟子關係，而非長官下屬關係。黃佐《翰林記·公私聚會序坐》曾說：

今之諸曹百執事，各有長屬，以法相視事。有稟白，可不可，則唯唯而退。以事當出，立受約束于庭，已，俛首去，不敢漫及他語。其勢分懸絕固然，莫殊也。惟館閣以道德文字為事，雖師保耆宿，位尊而望重，亦與後進之士相賓主。上下議論，閭閻侃侃，各中其度，情交而義達。喜有慶，行有饒，周旋乎禮樂，而發越乎文章，倡和聯屬，蠢蠢而不厭，所以汲引成就之意甚厚。此詞林之盛事也。⁴⁸⁾

此文指出臺省官屬以勢位相統屬，上下屬之間形勢懸隔；館閣則以文章道德相師友，情義彌厚。證諸李東陽在〈壽都憲閔公七十詩序〉中描寫臺省官員為：「自分曹限職以來，朝署無私語，道途不並驅。」⁴⁹⁾與吳寬〈送陳編修師召南歸展墓序〉所說翰林故事：「凡官翰林者，其人或省親，或展墓，自閣老院長而下咸作詩以贈其行。至序所以作者之意，則以次而為，其年之先後，秩之崇卑，皆不之計。蓋翰林故事也。」⁵⁰⁾其差異至為明顯。

在這樣的情況下，館閣詞林自視亦高，如王鏊經常自稱「翰林王鏊」，楊慎（1488-1559）被謫永戍雲南時，昆明人都以狀元公看他，他也仍然以詞林自許。王樵的兒子肯堂，進士只中三甲，「上而官府，下而親眷，皆有侮心」，一旦考上庶吉士後，親朋觀感頓殊，所謂「一聞翰選，便又改容易貌」。⁵¹⁾即使是

48) 黃佐，《翰林記》，卷1，第15頁下。

49) 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後稿》，卷2，第22頁。

50)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40，第1頁。

公安三袁中的袁宗道，既然身在翰林，文集中也就保存了兩卷〈館閣文類〉，⁵²⁾比起其他二袁文集，顯得別有不同。三袁彼此友愛，袁宗道當然並無炫耀之意，但是館閣本來就具有令人特殊化的地位，袁宗道的表現十分正常。

相對於制度所付予館閣詞林的禮遇，館閣之外的人又是怎樣看詞林呢？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向他們求文。我們從大量的資料可以看到明代館閣文章受歡迎程度，就如楊士奇〈曾公榮墓碑〉中所說：「嘗有四方求者，無間貴賤，日集庭下，靡不酬應。一時文人所作碑碣記序表贊傳銘詩賦，流布遠邇，未有如子啟之富者。」⁵³⁾之類的記述，觸目皆是。再如我在前面指出的，《李東陽集·文前稿》的序記類文章，只有六篇是為自己而作，這六篇中，又有〈應天府鄉試錄序〉、〈順天府鄉試錄序〉、〈會試錄序〉是應職務需要所作，⁵⁴⁾只有〈京闈同年會詩序〉、〈會合聯句序〉和〈中元謁陵遇雨記〉三篇，⁵⁵⁾才是自己參加其中而作的。除此之外，都是應人之求而作，差別只有館閣與非館閣，熟人與不熟之人而已。像這樣的作文風氣，歷經整個明代而不衰。而求文者對於館閣詞林的崇拜，獲文之後的滿足感，也都經常呈現在明人文集裡。⁵⁶⁾

所以，館閣詞林有獨特的禮遇、獨特的升遷系統、獨特的優游生活、獨特的官場倫理，再加上所有的翰林都是在科甲中最頂尖者，即使還只是庶吉士，他們的尊貴也是超越一般進士的。翰林入館之後，一般的在職年資都很久，動輒二十、三十年，如此長期在自居為天下中心的人，他們的自信力與內聚力之

51) 見王樵，《方麓集》，卷9，第43頁，〈與仲男肯堂書三十五首〉。此乃其中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所寄書中之語，翰選即指館選為庶吉士。

52) 見袁宗道著，錢伯城標點，《白蘇齋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此書卷七及卷八有「館閣文類」。又，劉士驥，《蟋蟀軒草》，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集中載庶吉士時期所作文章甚多，皆於題下標明「館課」、「館試」、「閣試」等。又，周如砥，《青藜館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亦有「館課」多篇。

53)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14，第6頁上。

54) 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前稿》，卷6，第80頁、卷6，第96頁、卷6，第108頁。

55) 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前稿》，卷6，第87頁、卷6，第76頁、卷6，第161頁。

56) 參閱中國古典文學會，《古典文學第八集》（臺北，學生書局，1986年），第313-356頁，簡錦松，〈論明代文學思潮中的學古與求真〉。

強大，即使是局外人如我們也能察覺。館閣體之成立，便是這種內聚力的反映。

2) 文集中所反映的館閣詞林內聚力

本節中，將以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楊士奇、王鏊、李東陽、李夢陽、何景明等五家文集，分析其〈序〉與〈記〉兩類文章所呈現的人際關係，來觀察館閣詞林的內聚力。由於序記文章都有受文者，部份文章還有受文者的介紹人，我希望藉由統計作者與受文者或介紹人之間的關係，來進行這項考察。

〈表一〉至〈表五〉中的分類欄，依受文者的出身條件分為六類，凡為本人生活所需或職務上必要的自撰文章，列第一欄「本人」；凡受文者或關係人有出身於館閣詞林者，列入第二欄「館閣」；凡受文者或關係人與作者僅知有同鄉關係者，列入第三欄「鄉里」；親戚同年門生，列入第四欄「親戚同年門生」；如果僅為相識官員，與詞林無預者，列入第五欄「友人」，並無官職但與作者為友者，數量極少，也列入本類；如因資料不足、受文者身分難以判別關係者，列為第六欄「其他」。表中除了舉出篇數之外，還有百分比。

表一·楊士奇東里文集所見交友關係統計表

受文者	序類		記類		墓文類	
本人	7	7%	3	11%	1	1%
館閣	42	41%	10	37%	45	51%
鄉里	25	24%	3	11%	18	20%
親戚同年門生	7	7%	1	4%	4	5%
友人	22	21%	10	37%	13	15%
不詳	0	0%	0	0%	7	8%
合計	103	100%	27	100%	88	100%

表二·李東陽集文前稿所見交友關係統計表

受文者	序類		記類	
本人	3	3%	1	2%
館閣	44	48%	12	29%
鄉里	3	3%	4	9%
親戚同年門生	14	15%	7	16%
友人	29	31%	19	44%
不詳	0	0%	0	0%
合計	93	100%	43	100%

表三·王鏊震澤集所見交友關係統計表

受文者	序類	記類
本人	11 19%	1 2%
館閣	14 24%	2 5%
鄉里	18 31%	22 54%
親戚同年門生	3 5%	4 10%
友人	11 19%	12 29%
不詳	1 2%	0 0%
合計	58 100%	41 100%

表四·李夢陽空同集所見交友關係統計表

受文者	序類	記類
本人	9 11%	7 33%
館閣	1 1%	0 0%
鄉里	26 32%	3 3%
親戚同年門生	22 27%	9 9%
友人	22 27%	2 10%
不詳	2 2%	0 0%
合計	82 100%	21 100%

表五·何景明大復集所見交友關係統計表

受文者	序類	記類
本人	6 22%	1 20%
館閣	2 7%	0 0%
鄉里	11 41%	3 60%
親戚同年門生	4 15%	0 0%
友人	4 15%	1 20%
不詳	0 0%	0 0%
合計	27 100%	5 100%

關於百分比的問題，我必須稍作說明，由於館閣人數極少，以同科進士出身的人數來比較的話，明代每科錄取的進士人數約為三、四百人不等，其中能夠立即進入翰林院的只有一甲三人而已，二甲、三甲者，每科大約二十餘人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但不一定每科都選取。庶吉士在翰林院學習三年之後，從中再選拔數人進入翰林院分授編修或檢討。因此，館閣詞林的人數極為稀少，比例甚為懸殊。⁵⁷⁾如果再加上舉貢兩途出身的官員人數，則館閣欄與友人欄的基本比數，更加不成比率。例如「表一·楊士奇東里文集所見交友關係統計表」中，館閣欄的「序」類文章比率佔41%，友人欄21%，表面上只有20%的差距，但如果考慮到雙方人員的基本比數的話，其差距就不只百分之二百了。因此，這樣的統計比較方式，本來就是非常不得已的事，讀者在觀看館閣詞林與非館閣詞林在各項比較的百分比時，不能只看表面的數值，還要考慮到它真實的相對值。除了本節的各表之外，後文還有〈表六〉及〈表七〉，也是一樣。

回到本題來，據各表的百分比顯示，楊士奇、李東陽、王鏊三人為翰林友人所作的篇章，都占了很大的比例。「序」類文章中，楊士奇《東里文集》、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前稿》中「館閣」與「友人」兩欄的比例懸殊，不必說了，王鏊因為退休在蘇州居住較久，所以與館閣以外的往來稍多，但仍是「館閣」欄篇數仍居多。在「記」類文章中，楊士奇《東里文集》、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前

57) 詳細數目，可查閱朱保炯，《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又參見，龔延明、邱進春，〈明代登科進士總數考〉，《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6卷，第3期，2006年5月，第69-78頁。

稿)的「館閣」與「友人」兩欄比率相近,王鏊《震澤集》甚至「館閣」欄篇數遠少於「友人」欄。

受託作文,本是館閣詞林必有的應酬,而以「記」類和「墓文」類為甚。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前稿》十九篇為館閣以外友人所作的文章中,至少有九篇是受不相識的人透過關係輾轉請託而作的,其他可以想見。至於王鏊的現象,與他退官後在蘇州太湖鄉居十六年有很大關係。總之,像這樣的情況,外有各界強大的應酬需求,他們卻仍有那麼多篇數,是在館閣以內互動,說明了館閣詞林內部往來的密切,絕不是偶然的。

相反的,當我們檢驗李夢陽、何景明二人的文集,只看到他們與館閣詞林極少交往。李夢陽的「記、序」類文章中只有一篇談到楊一清,他是李夢陽之師,曾入內閣。此外他在〈詩集自序〉一文中寫到王崇文,王崇文曾入庶吉士,但散館即外授部職,並不算真正的館閣一員。除此之外,即使連墓文及詩類都計算,他的墓文也只有〈賈公墓志〉一文,⁵⁸⁾是為翰林院編修出身、現任南京國子祭酒賈詠之父所作。在李夢陽的詩篇中,除了康海修撰、王九思修撰本來就是前七子概念內的人物之外,與他有酬答往來到的館閣之人,僅僅只有陸深、沈編修、嚴編修嵩等三人各有一次,⁵⁹⁾以及徐編修縉三次而已,⁶⁰⁾李夢陽詩數量極多,而這六首詩所佔比率極微。甚至他在〈朝正倡和詩跋〉一文中,⁶¹⁾列舉了王守仁、邊貢、何景明等十九位郎署人士之後,只用「諸在翰林者以人眾不敘」一筆帶過。此文作於正德六年劉瑾誅後,其時翰林出身的康、王二人已受牽連而去職,李夢陽與二人亦已不復往來,所以不記二人,事出有因。但是,這篇文章中既然已經記載了十九人,再多寫幾位翰林院人士也未必嫌多,為何他故意不記呢?其根本原因,就是郎署與館閣之間本來就有區隔。

58) 見李夢陽,《空同先生集》,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6年,卷45,第1291頁。

59) 見李夢陽,《空同先生集》,陸、沈、嚴三人分見卷9,第188頁、卷19,第453頁、卷31,第837頁。

60) 見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9,第188頁、卷19,第451頁、卷31,第827頁。

61) 李夢陽,《空同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59,第18頁下。關於〈朝正倡和詩跋〉,參看簡錦松《李何詩論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第69-74頁。

至於何景明，他在內閣誥敕署任職中書舍人多年，這雖不是館閣之官，但因職務關係，應該與翰林諸公十分接近。可是，在何景明的文章中也絕少與館閣詞林往來的跡象。他在〈武功縣志序〉曾寫到狀元康海，⁶²⁾在〈漢記序〉中說：「是書（按：指漢記）余得之侍讀徐子容氏；余至關中，呂仲木涇野子移書求之，乃遂請其校正。」⁶³⁾徐子容即徐縉，當時為翰林侍讀學士，呂仲木即呂柟，正德三年（1508）狀元，授翰林修撰，後官至禮部侍郎；此外，〈海叟集序〉也談到翰林陸深而已。⁶⁴⁾但康海是他的同年，又是復古運動的盟友，關係不同。而且何景明撰此文時，康海早已不在館閣了，所以嚴格說，只有徐縉、呂柟、陸深三人而已。

其次，在「鄉里」欄，楊士奇相當照顧鄉里，所以，因鄉里關係而寫的篇數雖仍遠不及與館閣關係，但其比重已經不小。李東陽因為上代就遷離故鄉，長居北京，為鄉里而作的文章較少。他們二人都長年在京，難得回本籍一次，文集的同鄉關係，多是鄉人到京相認，或鄉人往求文字，或鄉人來報告故鄉之事。⁶⁵⁾王鏊則自館閣退官家居十六年，他的文章中很多是與鄉里有關係的，但館閣關係也不疏遠，仍帶有相當分明的館閣出身色彩。

李夢陽是陝西慶陽人，但他早已移居大梁（開封），他自江西提學副使任內被迫提前致休以後，就長居大梁，以大梁為故里（李夢陽文集統計表上的鄉里一欄主要是指大梁），從比率上可以發現，他非常多的篇章都與此地有關。何景明主要的任官地點在北京，但因為正德二年至六年間，曾告病回信陽鄉居多年，因而與信陽故里有關的文章比率大於其他各欄位的數值。

至於，「親戚、同年、門生」關係的篇數，李夢陽及何景明二集遠多於楊士奇、李東陽、王鏊三集，很值得注意，尤其是門生關係。楊士奇、李東陽、王

62) 見何景明著、李淑毅點校，《何大復集》，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34，第599頁。

63) 何景明，《何大復集》，卷34，第597頁。

64) 何景明，《何大復集》，卷34，第594頁。

65) 何景明，《何大復集》，卷37，第650頁，〈甯母朱太夫人狀〉：「予未交識兵備，兵備在信陽，予仕于京。」信陽是何景明故鄉，當時他人在北京，故鄉人士來京請他作文。此類例子極多。

鑿的門生關係，都來自科舉所取士，⁶⁶⁾李、何則有許多因文學而結合的詩文弟子，尤其是李夢陽退居大梁時期，在政治上已完全退出，卻仍有許多慕名而來的詩文弟子，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⁶⁷⁾

上述的種種比率情狀，其實不只楊士奇等五家文集而已，我還分析了倪謙《倪文僖集》、吳寬《匏翁家藏稿》、嚴嵩《鈐山堂集》、張居正《太岳集》、王錫爵《王文肅集》、李維楨《大泌山房集》、錢謙益《初學集》《有學集》等數十部館閣名家文集，以及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袁宏道《袁中郎集》等非館閣之人的文集，都有相似的比率現象，為節省篇幅，只舉出前述五家。在文類方面，除了「序、記」二類，「墓文」類我也做了分析，也限於篇幅，只選列了楊士奇一人而已。近人動輒喜用「取樣太少，未作全面統計，不宜以為通例」之類的思惟來譏彈論文，我極不同意。如果有人非要其他各文集的數據，請來信向我索取。

大凡文章的受文者或關係人，實際上就反映了作者的交遊網絡，詞林們把大量的文章往來設定在「館閣」之內交流，他們彼此之間當然會形成較大的內凝力，而把關係較疏遠的人排除在外。對比於李夢陽和何景明這兩位當代最著名的文家，幾乎不與館閣往來，此一現象所蘊含的集團內聚力量的意義，可說是非常清楚的。

綜上所見，館閣詞林對外享受著高度的榮耀，對內則在自己的圈子內以高度的內聚力自相酬應，也就無怪乎他們會因師生及同儕情誼而產生共同的文學話題，取用相似的文學範式，接受共同形成的寫作約束，乃至被稱為館閣之體

66) 嘉、隆以後至明末文人喜談師承，「西涯門人」遂成口實，特別是錢謙益，《列朝詩集》，第269頁，以石熊峰、羅圭峰、邵寶、顧清、魯鐸、何孟春六人為西涯門人，擬之於蘇門六君子。其實石、羅、顧、魯為庶吉士時，李為館師，邵為李南畿所取士，何乃李會試所取士，都是科舉制度下之門生。

67) 李夢陽所收詩弟子極多，舉進士已得官職者不論，舉人如黃省曾，不第如張含，富商如余育、程誥、鄭作、鮑弼、鮑演、鮑雄、鮑宇、鮑輔、鮑光雄、鮑崇相、汪時嵩等，都與他在大梁經常往來。何景明弟子中較有名者如孫繼芳、戴冠、張詩都是詩弟子，樊鵬是世交，只有喬世寧是他在陝西提學副使任內所識拔之士，與職務有關，請參閱簡錦松，《李何詩論研究》，第88-101頁。

或臺閣體。

何宗彥〈王文肅公文草序〉曾對館閣詞林的文學共同約束，作過如下解釋：

夫館閣，文章之府也。其職顯，故其體裁辨；其制嚴，故不敢自放於規矩之外，以核其奇。⁶⁸⁾

何氏所說的「其制嚴」，除了尚未得到授官的庶吉士有考試約束外，對於已獲翰林院官職的新進人員來說，也或許還有來自師長的指導與前輩的壓力。但如果整個詞林都「不敢自放於規矩之外」，那就是團體內的同儕約束力量了。

總之，只要制度不滅，同儕內聚力所帶來的寫作約束力，自然不滅，而臺閣體也隨之永遠存在，它是制度下的產物，與經由強有力的文人所開創領導的文學流派，迥不相同。

4. 李夢陽崛起的真正改變與臺閣體傳承之變局

明代文學研究者，常常以臺閣體之弊和前七子反對臺閣體作為話題，再進一步，則指述李東陽與前七子之間由於種種人身恩怨，而牽動了雙方的論爭。我在寫《李何詩論研究》和《明代文學批評》二書時，也沒有完全脫離這個思路。

近年來，我仔細檢驗明人文集，深覺得從人身恩怨來討論明代中期文壇的變化，並不恰當。李夢陽為首的前七子，並不是因為李東陽等臺閣大老主導文壇，便執意去反對前輩所創造的現況。我認為，館閣詞林在學古方面，本來就有寬宏博學的風氣，他們的文章受到市場需求的牽引，不免附合於文學庸俗化的洪流。當復古派以刻苦的學古行動，要求拔今起俗，「引而上之」之時，得到廣泛的響應，並不是意氣之爭。至於發生在明末清初的評價之爭，與館閣詞林

68) 黃宗羲，《明文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253，第11頁下。

的身分自覺，脫離不了關係。關於這些問題，我都曾撰文討論。⁶⁹⁾

本文中，我還要提出兩個觀點，來檢視李夢陽崛起的意義，第一，李夢陽等人在創作實踐上，表現出一望可知與昔人完全不同的全新面目，吸引了追隨者。第二、李夢陽開啟了館閣以外的文學潮，指出了非館閣詞林也能成就為文壇領袖的可能性。就是這兩個方面，給既存的文壇生態帶來巨幅的變化。

1) 與館閣詞林體貌迥殊的李夢陽一派的文章新樣

在李夢陽之前，明代文壇上是以「臺閣體」為詩文主流。臺閣體是一個龐大的體系，從核心點來看，他們師法歐陽修本為共識，如前舉張慎言〈何文毅公全集序〉：「於是文章尚宋廬陵氏，號臺閣體」之語，經常可見。但事實上，館閣中仍充滿著博學而不定於一尊的想法，詞林師法歐陽修，並沒有排斥他人。大量館閣詞林的文集裡，幾乎沒有談到獨尊的文學宗尚，特別是在墓文中，偶而見到「好古文詞」的記載，都是採取各有所好、博采兼納的寬博見解。以《李東陽集》而言，他所有的墓文，除了少數篇章略略談及墓主「工古今詩文」之外，⁷⁰⁾絕大部份都沒有談到墓主的文學，他為前輩、為友人、或為自己所作的詩文集序，持論也同樣採取寬博的學古觀。

可是李夢陽一派不同，他是以相當鮮明的旗幟，高音的鼓吹，對外號召。因而，凡認同李夢陽、與李夢陽結合者，其文集往往有如下的明顯特徵：

第1，大量出現討論詩文取向的篇章：

李夢陽、何景明對於所為寫序或立碑作傳的對象，幾乎都記載其文學趨向，有的談秦漢左馬、有的談漢魏李杜，有的談古學，眾所熟知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只是一句被簡化了的口號。⁷¹⁾

69) 見簡錦松：〈錢謙益文學批評之基本立場新論〉，臺灣中山大學：《第七屆清代學術會議論文集》，2002年04月，第847-868頁。又參見註57。

70) 如〈閔公朝瑛神道碑銘〉一文，見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後稿》，卷19，頁269。

71) 「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乃「文必先秦兩漢，詩則古體必三百首、漢、魏，近體必盛唐」的

舉例言之，文徵明是向蘇州文苑引進李夢陽之學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因為他歡迎李夢陽，所以，《文徵明集》裡的墓文，出現了大量談論當事人接受復古派的傾向。例如：

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為師。……雄深爾雅，足自名家。〈顧公璘墓志銘〉⁷²⁾
 為文必先秦兩漢為法。〈袁君永之墓志銘〉⁷³⁾
 尤喜左氏及司馬班揚之書，……為文奇崛深奧。〈錢孔周墓志銘〉⁷⁴⁾
 而酷喜左氏。……為文必古人為師，自兩漢而下，咸有所擇。〈皇甫淳墓志銘〉⁷⁵⁾
 為文必先秦兩漢為法，……奧雅宏肆，潤而不浮。〈翰林蔡羽墓志銘〉⁷⁶⁾
 為文非遷固不學，詩必盛唐，見諸論撰，咸有法程。〈王寵墓志銘〉⁷⁷⁾
 論著必法左氏，鑄詞命意，精鍊峭拔，不劇致不已。〈文公森行狀〉⁷⁸⁾

以上各篇的當事人中，顧璘（1476-1545）是李夢陽的老友，他首先率領吳人迎納北學。袁袞（1502-1547）、皇甫淳（1497-1546）、王寵（1494-1533）則是身在吳地而接受復古派的後起之秀。至於錢同愛（字孔周，1475-1549）、蔡羽（1474?-1541）二人，履歷幾乎不出吳中，與復古派的關係很間接，文林（1445-1499）是文徵明之父，以文林的性情與行事風格來看，他並不是激烈地堅持某種文學宗主的人。但是，文徵明也在他們的墓文中，都強調其人具有復古派的文學趨向。特別是他作〈太傅王文恪公傳〉時，說王鏊：「晚益精詣，鑄詞發藻，必先秦兩漢為法。」⁷⁹⁾把王鏊也拉進北學之列。這件事在王鏊自己的《震澤集》中從未被提起，《震澤集》的編排和各篇文章面貌，也絲毫沒有李夢陽一派的作風，但文徵明卻下了這樣的評論。

省略。

72) 文徵明，周道振點校，《文徵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32，第743頁。

73)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33，第761頁。

74)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33，第756頁。

75)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33，第752頁。

76)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32，第735頁。

77)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31，第713頁。

78)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26，第629頁。

79)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28，第656頁。

第二，同派的文集內容有明顯特徵：在李夢陽本人及其友人、門人、後世追隨者的文集中，必有模擬《詩經》、古樂府，或《尚書》、《左傳》的作品。在古近體詩方面，各體裁的數量比率結構，五古多於五律，又多於七言律絕，也與非復古派作者的文集不同。他們又喜歡以「子」相稱，整部詩文集中都是張子、李子、王子之稱，甚至被人譏為「子字股」。⁸⁰⁾

第三，文集中出現許多詩文弟子：在明代，領袖級的人士都有追隨者，李東陽也有許多追隨者，但他們並不以詩文弟子的名義相隨。明代文學研究者常用「李東陽茶陵派」一詞，事實上，李東陽的領袖凝聚力與不僅來自本人的文學實力，更多是來自館閣的制度使然。他主考會試，掌教翰林，最後又入了閣，追隨他的人當然很多，如果有所謂茶陵派，就是這些在文官體制下的師生關係。從李東陽的《李東陽集》和《懷麓堂詩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除了科舉的門生和翰林師生關係外，幾乎沒有其他詩文弟子的記載。不但李東陽沒有在科舉以外形成流派，所有李東陽之前的館閣詞林的個人文集中，也都沒有形成詩文弟子，聚為一派的跡象。⁸¹⁾

李夢陽改變了這種師生結構，在《空同集》中，出現了許多詩文弟子，其中有後進的官員，也有未仕者，甚至商人。⁸²⁾前七子的其他人，如康海、何景明等人也有詩文弟子。王九思〈漫興十首之四〉甚至說：「成化以來誰擅場，豪傑爭趨懷麓堂。不有李、康持鑒藻，都令後進入門牆。」⁸³⁾

從上面三點來看，這樣鮮明的宣傳其主張，令人開卷即知派系特徵的作

80) 焦竑，《國朝獻徵錄》，卷21，第43頁，總110-025頁，張治道，〈康海行狀〉云：「西涯見之，益大銜之，因呼為子字股，蓋以數公為文稱子故也。」

81) 李東陽的門生，參見註66。又李東陽，《李東陽集·附錄》，第449頁，靳貴〈懷麓堂文集後序〉云：「蓋操文柄四十餘年，出其門者號有家法。雖在疏遠，亦竊效其詞規字體，以競風韻之末而鳴一時。」靳貴（1464-1520）是弘治三年進士一甲第三人，授編修，長期在館閣。此文後為錢謙益節錄入《列傳詩集小傳》。所謂出其門者，是明代針對會試師生的術語，所謂疏遠，相對於館閣，指任官在州縣者。與復古派的純粹詩文弟子不同。

82) 李夢陽詩文弟子，參見註67。

83) 王九思：《漢陂集》，臺北，偉文圖書公司，1976年，卷6，第15頁上，總第227頁。這組詩包含了前七子及重要的贊同者。

風，在李夢陽以前是完全沒有的。而李夢陽文集中所出現的詩文弟子，更是全新的文壇結構上的重大變化。

不過，李夢陽一派之所以震撼當代文壇，還是在實際的詩文表現上，一望即知與前人面目完全不同。

李夢陽的文章受《左傳》影響頗多，他的記敘文字，簡潔生動，取材特異，讀起來有強烈的魅力，與館閣之文絕不相似，以下舉出他在正德三年所作〈遊輝縣雜記〉的片段為例：

邊寺（指中湖寺）磽田以千數，然故櫟橡礪磊區耳。於是寺僧招流人墾之，租其人，率斬茅菅、阻巖崦、為聚落，煙火裊裊相雜也。其流人若婦，并為寺僧使，乃其婦則於邊寺泉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見兩三婦置桶巖滴下，而偃坐厂下。然青羊白戈過其聚落，聚落人輒飲食之，得無害。青羊白戈感其飲食數，亦輒贈遺之，為常焉。輝縣產魚稻，然其人多病瘦。偕予行者二人，一曰馮貴，二曰左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為雲，已，知其山也，益又喜，躍馬行，懊不即至山。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於山川土俗之別云。⁸⁴⁾

從文章中可以看出李夢陽在語法間極力求合於《左傳》，而內容取材上，更有別館閣詞林雍容和樂的習慣。文中談到三件事，前兩件為墾租戶的女人為和尚挑水，以及墾租戶與太行山群盜（青羊白戈）往來相處的情狀，都是館閣文章所不可能出現的；另一件寫內弟左國玉第一次看見山的動作神態。在一般觀念中，婦女與僧人不應該發生任何關係，聚落人民也不應結交盜匪，但是這兩件事對李夢陽而言，似乎並無忌諱。記內弟的興奮到近乎癡態，又十分生動，而且符合一般人的反應，沒有誇飾，也沒有官員氣。袁宗道在〈論文上〉談到李夢陽時，曾說：「且空同諸文尚多己意，記事述情往往逼真。」⁸⁵⁾在〈論文上〉這篇文章裡，袁宗道將李夢陽批評得極為苛酷，但這句話確實看見李夢陽好處。其實李夢陽開啟了敘事逼真，不講空話的道路，正是以後談性靈者的啟蒙。但是，李夢陽這個長處被復古的強烈主張所掩蓋，攻擊他的人也都不

84) 李夢陽，《空同集》，卷48，第15頁下。

85) 見袁宗道，《白蘇齋類集》，卷20，第283頁，〈論文上〉。

看這一點。⁸⁶⁾

試以吳寬〈南野記〉與前引〈遊輝縣雜記〉比較：

去歲之冬，予以事出城之東北，扁舟行三十里，見積水渺然，捕魚擱鰲之徒，往來於其間，民際水而屋，泛泛若野航。問之民：此江湖耶？則以田對。予因驚曰：「方冬水宜涸而其勢如此，彼春夏之時，民之妨於耕耘也，信哉。」於是折南，又行二十餘里，其田稍高，隱然有疆……，視其田間，稻本固在，予方喜此地嘗有秋矣。及視其民皆有飢色，復就問之，對曰：「田之所入不足以供賦稅，且稱貸於人足之，尚何暇為口腹計耶？」因益念曰：「此有秋者且不能自給，如江如湖者當何如？」⁸⁷⁾

同樣寫人民與田地，文章長短也相似，吳寬只能說一件事，最多可以分析為洪泛區與高田區，記述了兩地農民的境遇與共同的困難。而李夢陽從寺田、招墾，談到墾戶婦女、山中盜賊、居人多瘦、內弟騎馬望山情狀，每說一事，三四語便說盡，因而能夠所記甚多而每事皆奇。這兩段文章的對比，雖不能說代表了臺閣體與復古派的根本差異，卻也值得以此為分裂的出發點，去探討兩方的不同。

如果拿李夢陽這段短文再與楊士奇〈遊東山記〉⁸⁸⁾、李東陽〈山行記〉⁸⁹⁾、王鏊〈興福寺山居記〉⁹⁰⁾相比較，更是一望而知其不同。楊、李、三文雖然也極力追求敘事的生動，雖然也同樣有人物對話，雖然也都力求注意細微之處，但是他們所看見的注意點根本不一樣，李夢陽所寫種種，皆在館閣諸公的落想之外，館閣諸人所追求的鳴盛之樂與憂國憂民之情，在李夢陽則一

86) 袁宗道出身館閣，他對李夢陽的嚴厲批評，乃是立場問題。以此例來說，他看到李夢陽文章記事述情的好處，卻不承認李夢陽的改革，顯然並不公道。事實上，李夢陽所開發的文章新境，相對於館閣詞林的文章，可說是明顯的解放，後來公安三袁與竟陵鍾譚強調個性的文章，若論其起源，應推始於李夢陽。請將上段引文與譚元春〈游玄嶽記〉對比即知。該文見〔明〕譚元春撰：《譚元春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20，第545頁。

87)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33，第1頁上。

88) 楊士奇，《東里文集》，卷1，第1頁上。

89) 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後稿》，卷7，第106頁。

90) 王鏊，《震澤集》，卷16，第5頁下，總第414-360頁。

毫也無；至於文句鍛鍊方法的路線差異，更不在話下。另外，楊士奇〈西園雅集圖記〉⁹¹⁾、吳寬〈冬日賞菊圖記〉⁹²⁾、李東陽的〈甲申十同年圖詩序〉⁹³⁾、李夢陽的〈賓貢圖記〉⁹⁴⁾這四篇文章，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可惜因為論文長度限制，難以詳談，請讀者自行取書比對。

《空同集》的文章，除了取則《左傳》之外，還有許多師法典謨的文章，像〈觀風河洛序〉、〈何公四圖詩序〉、〈刻戴大理詩序〉、〈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潁上序〉等篇，⁹⁵⁾都是古色斑斕，讀之艱難。但都不如湛若水的〈東征武成序〉，此文學古更為徹底：

惟十有四年，民興胥咨曰：「惟天降割于廣氓，群盜斥斥，聚嘯山谷，擄我妻孥，掠我財資，糜我骨肉。徂茲太保郭公，將征復沮，遂于茲。天乎奈何！」毛侍御以聞，皇帝曰：「俞哉！惟爾撫鎮鎮巡，爾其徂征，奮乃果毅，克厥成功，以耀予武。」遂以從事都憲楊公適至曰：「予職惟罔弗督，弗餉弗調，予惟弗武。……」⁹⁶⁾

像這樣的古文，明顯的在模擬《尚書》，如果持此文，與本文各小節中曾經引述的館閣詞臣任何文章片段對比，便知為截然不同的全新作法。湛氏是著名的理學家，他與同時的理學家都經常以「勿陷溺詩文」勸人，自己為文卻深刻地贊同李夢陽，非常有趣。

從以上簡短的比較，應可發現李夢陽一派的實際作品，⁹⁷⁾與館閣文章有鮮

91) 楊士奇，《東里全集·續集》，卷6，第12頁上。

92) 吳寬，《匏翁家藏集》，卷38，第5頁上。

93) 李東陽，《李東陽集·文後稿》卷3，第39頁。

94) 李夢陽，《空同集》，卷48，第8頁下。

95) 見 李夢陽，《空同集》，四篇文章分載卷51，第12頁上、卷52，頁第11頁上、卷52，第8頁上、卷55，第4頁下。

96) 見湛若水撰，《湛甘泉先生文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卷17，第90頁，總第56-728頁。湛氏此文的問題，為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鍾彩鈞先生首先發現，電話告余。

97) 本文僅舉文章，詩的部份，請參見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文學篇》，2004年，第93-138頁，簡錦松，〈從李夢陽詩集檢驗其復古思想之真實義〉。

明的差異，所以當他們一開始高唱復古，便很難與館閣詞林原來的文章觀念並存，他們的追隨者很迅速地就能夠從文章表面，發現本派系的特徵，而加以模仿、散播。館閣文體百餘年來並未建立強制性的宗主，而復古派則自然地建立具有排他性的宗主論，這些都彷彿有宿命存焉。

2) 由明人文集所見李夢陽以後館閣內外力量之消長

我在1987年提出「館閣文權下移」一語，現在已廣為學界所採用。李夢陽崛起的意義，不只是個人的成敗，而是造成了館閣文權下移的文壇巨大變局。

從現存明人文集來看，在李夢陽之前，所有的文章大家幾乎都出自館閣。既然同在館閣，個人的同異已不重要。我們可以看到，從楊士奇到倪謙、吳寬、王鏊、李東陽，他們的文章雖然明顯相似，卻也有顯著的相異點，但是並沒有人指出其差別，也無人認為有指出其同異的需要，所有的異議，自然融合在同官同寮的機制裡。館閣被認為是領導文壇的，人們習慣性地稱他們的領袖為「掌文柄」者，整個文壇在一個穩定的結構下發展著。

即使在李夢陽崛起之後，館閣詞林仍然有強烈的主導文壇的意識，我查閱了明人文集八百餘種後發現，凡是文集主人曾任翰林之官，或單單只選入為庶吉士，必定會在文集裡被表揚出來。館閣中一些升遷較好的人，更經常顯露出欲為文壇領導的自我期許，並不因為李、何崛起的變局而有所止緩。換言之，「臺閣體」的活動力在整個明代都是持續的，未嘗斷絕，在文學主張上，即使復古派的文學主張已經從館閣以外滲透到它的內部了，它仍然持續地以本身的自淨功能，一次又一次不斷地回歸「博學、好古文詞」的基本面；每隔二、三十年，就有人起而領導館閣詞林，意圖重握文柄而有所作為。但是，臺閣體的存續固然是事實，而館閣領袖希望回復當年的盛況，卻未能實現，一直到錢謙益，才重新以館閣詞林繼承人之姿成為文壇主盟，但明朝已經滅亡了。

造成這樣大的變局，仍是結構性的問題，文壇的舊式結構被打破了，而領軍打破這個既成結構的人，正是李夢陽等人。回顧到弘治、正德之際，由於過

去從來沒有自館閣以外發出文學主張的例子，所以，當李夢陽、何景明這個小集團初成立時，還是籠罩在館閣詞林之下。當時館閣中，除了主掌文柄的閣老外，新科的翰林和庶吉士們中，很多人發出了想要突破現狀的聲音，像前七子的王九思，就對他在庶吉士時期追隨李東陽學習詩古文的經驗，表達強烈不滿。康海也以李東陽所領導的詩文風格靡弱為由，號召同輩以關中的秦聲來矯之。⁹⁸⁾可是，不滿歸不滿，我們必須注意到一點，館閣制度是官僚制度，並不是文學組織，文學組織可能因意見離合、人事聚散而改變，官僚制度下的人事關係，是持續存在的，不會因個人文學見解而離合聚散。

王九思、康海、王廷相都出身翰林院。王九思是弘治九年進士，館選庶吉士，散館後授翰林檢討；康海是弘治十五年狀元，初授已得修撰之職；王廷相也是弘治十五年進士、庶吉士，散館後外放，未留在翰林院。正如《左傳·哀公十六年》楚子西在聽到王孫勝將謀反的消息所說的：「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老一輩館閣詞臣凋謝之後，康、王等後進之士，自然而然成為館閣的重臣、文壇的領導，這是不爭的事實，康、王心中，也自然有這層了解。所以王九思在館選庶吉士時所作的詩文，就是揣摩李東陽風格而成的，這一點，他事後到處向人說，並且被李開先把它記載在〈漢陂王檢討傳〉中。⁹⁹⁾

換言之，假如不是後來起了人事變化，王廷相先出為兵科給事中，王九思繼由翰林出為吏部文選司郎中，旋與康海俱因為劉瑾敗誅的牽連而廢逐，致使這一個新的文學運動參與者，都被迫移出館閣之外。相反的，如果康海等人長居館閣，如果他們又堅持復古與改革，那麼，在館閣詞林的制度下，縱使李夢陽的聲名再大，縱使李夢陽的文章有再多的成就，復古派領導人的地位，也終將拱手於康海等人。如此一來，這一段文學運動，也可能只成為館閣內部的變化而已，不會如今日所見，前七子的領導權卒歸於李夢陽之手，也不會有後來

98) 王九思事，見李開先，《李中麓集》，台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卷傳10，第34頁下，總第93-139頁，〈漢陂王檢討傳〉。康海事見黃宗羲《明文海》，卷243，第16頁上，總第2523頁，王世懋〈康對山集序〉，云：「先生當長沙柄文時，天下文靡弱矣。關中故多秦聲，而先生又以太史公質直之氣倡之，一時學士風移。」

99) 李開先，〈漢陂王檢討傳〉一文，詳述王九思在翰林九年，為劉瑾外調至吏部，一年升至文選司郎中，劉瑾既誅，九思亦受牽連而廢等情節。

館閣人才不繼，李夢陽成為館閣外最大的文學導師，而郎署文家陸續競出的重大變局。

歷史的發展何以至此，必須由成化、弘治、正德三朝的館閣故事談起。明憲宗成化皇帝在位二十三年，最初仍用李賢、陳文、彭時、商輅等前朝閣臣，以後又起用了劉定之、萬安、劉珣、劉吉、彭華、尹直，更換閣臣的原因是李賢、陳文、劉定之、彭時自然壽終，商輅年老致仕。此十人中，除李賢是天順帝為了讓他入閣而命兼翰林學士外，其他九人都是由科舉而入翰林的。明人對成化後期陳文、萬安、彭華、尹直的評價多有貶詞，但從整體看來，閣臣的執政期間長，其任命也合乎制度慣習，因而政局堪稱穩定。繼任的弘治皇帝，在位十八年，即位時陳文已死，他罷免萬安、彭華、尹直，留任劉吉，起用徐溥、劉健，以後劉吉致仕，又起用邱濬。及邱濬以病卒，乃起用李東陽、謝遷，以後徐溥致仕，遂專用劉、李、謝三人。前後所進用者都是由進士入翰林者，又是合乎制度慣習，執政期間也長，風評亦佳。所以，在明人的印象中，成、弘兩朝是政治穩定、民生復甦，也是館閣詞林極盛的時代。

到了正德皇帝即位，短短十五而已，閣臣除劉健、李東陽、謝遷外，前前後後又更換了十三人，內閣不穩定，再加上劉瑾之難，許多翰林離開了館閣，這時吳寬已於弘治十七年（1504）先卒，正德元年（1506）謝遷又致仕去，李東陽則於正德七年（1512）致仕，四年後去世，王鏊從正德四年（1509）自內閣致仕後退居吳下十六年，由於諸人相繼離去，館閣中並無名家。至嘉靖初年，因為世宗皇帝是以外藩入繼大統，又引發了所謂「大禮議」，正德六年的狀元、由翰林修撰升至經筵講官的楊慎，反對最激烈，被廷杖後謫戍雲南永昌衛，在滇三十五年。¹⁰⁰翰林中如編修湛若水、修撰呂柟等多人，或杖或責，而阿附帝旨的張璁，本非翰林，卻奉特旨超升為翰林學士，他一上任，就將所有的庶吉士解散到六部科道，翰苑為之一空，館閣中的詞林氣象，幾不復存在。所以詞林不能恢復，並不是純粹文學的緣故。而這個期間，正是文學上有李夢陽的古學、理學上有王守仁的心學崛起，一消一長，其勢可知。

100) 參閱王文才，《楊慎學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反觀李夢陽，他為人氣節凜然，在弘治、正德間，三度因觸怒外戚及宦官而下獄，幾死，極受時人推重。劉瑾誅後，他出任江西提學副使，在任上提倡《左傳》及秦漢文，並想以提學之力改造當地的府州縣學教育。何景明也在陝西提學副使任上，編輯《學約古文》，強力在府州縣學中推行古文的研讀。李夢陽的改革雖然並未成功，何景明也因過勞而先卒，但李夢陽退官後在開封府居住甚久，開封是南北交通衝要，他的影響力持續發揮，卒至於使古學滿天下。

所以，縱使館閣詞林仍然在三年一次的科舉之下，如常考試、如常錄取、如常選翰林官、如常選庶吉士，除了偶發的事故外，一切都正常地在進行，民間也依舊想盡辦法去索取詞林的文章墨寶，這些都沒有改變。但是李夢陽所帶動的力量已經形成，元氣不良的館閣詞林，已經喪失了維持文壇領袖的先機。

嘉靖年間，詞林中較著名的唐順之（1506-1560）、孫陞（1501-1560）、王維楨（1507-1555）都無法恢復當年館閣的景象。唐順之被一般文學史家用來作為反對李夢陽的代表，其實是找錯了人。他是嘉靖八年（1529）會試第一名，選為庶吉士，一度外放，嘉靖十二年（1533）才授翰林編修。他自述早年曾經背誦李夢陽的文章，進入館閣後，乃有所變化。不過，唐順之真正的轉變，是因為他的關心點已經由文學而轉向理學，這是從正德末年起，學界所瀰漫的追求性理之學的潮流，唐順之適逢其會而為其一員，在《荊川文集》中，隨處可見他主張文藝喪志，勸人勿作詩文的言論。所以，他與李夢陽之間的路線之別，並不是什麼秦漢文派與唐宋文派之爭。¹⁰¹⁾王維楨和孫陞是嘉靖十四年選入翰林，兩人都師法李夢陽，孫陞還稱贊王維楨是「與北地李獻吉接跡而起」。¹⁰²⁾但王維楨既死於陝西、河南、山西三省交界的大地震，¹⁰³⁾官僅到南京

101) 此事在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第四章，曾作討論。此外，唐順之與羅洪先、趙時春諸人削籍還家，清議極為推崇，其地位已不只是文學地位而已。

102) 見李攀龍，《滄溟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25，第584頁，〈王氏存笥稿跋〉。

103) 本次地震發生於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1556年1月23日）深夜，是明代規模最大，死亡毀損最嚴重的地震，山西、陝西、河南同時受災，震央在三省交界處的華

國子祭酒，孫亦僅官終南禮部尚書，職位尚卑，並未能由館閣發揮領導力量，在復古陣營中，聲勢也不高。

除此之外，嘉靖年間館閣人才極為不振，由新進翰林的表現就可以看得出來。總計嘉靖一朝十四次科舉，四十二位直接選入翰林的一甲進士中，只有姚涑、王教、徐階、羅洪先、程文德、孔天胤、孫陞、茅瓚、袁煒、瞿景淳、李春芳、唐汝楫、曹大章、諸大綬、王錫爵十五人留下文集，這十五家文集中，除了王錫爵《王文肅集五十二卷附錄二卷》、王教《中川遺稿三十三卷》、孔天胤《孔汝錫文集十六卷、詩十四卷》、孫陞《孫文恪集二十卷，附錄一卷》等四種卷數較多外，其餘人都是十五卷以下的小集。嘉靖五年的一甲翰林龔用卿、楊維傑、歐陽衢，嘉靖八年的一甲翰林楊名，嘉靖十一年的一甲翰林林大欽、高節，嘉靖十四年的一甲翰林韓應龍、吳山，嘉靖十七年的一甲翰林羅程，嘉靖二十年的一甲翰林沈坤、潘晟、邢一鳳，嘉靖二十三年的一甲翰林秦鳴雷、吳情，嘉靖二十六年的一甲翰林張春、胡正蒙，嘉靖二十九年的一甲翰林呂調陽、姜金和，嘉靖三十二年的一甲翰林陳謹、溫應祿，嘉靖三十五年的一甲翰林陶大臨、金達，嘉靖三十八年的一甲翰林丁士美、毛惇元、林士章，嘉靖四十一年的一甲翰林徐時行、余有丁，嘉靖四十四年的一甲翰林范應期、李自華、陳棟，都完全沒有著作傳世，無聲無息地消失了。比起成弘以前新科翰林往往成為館閣健將的往事，真是今非昔比。以這樣的陣容，面對李夢陽及其追隨者的強大壓力，當然不得不把壇坫讓人了。

總之，李夢陽的崛起及復古派的發展，除了李夢陽本人的魅力以及當時文壇上零星的改革思潮外，館閣內部紛擾不安、人才凋零的現況，應是造成這個結果的主因。

對於明代文學史來說，李夢陽所帶來的改變，不只是他個人而已，乃是牽動了文壇結構的巨大變化。前面說過，李夢陽一派既非館閣詞林，可是他們的文章受到盛大的歡迎，館閣文柄竟然下移到他們手中，這就鼓勵了相當多的有志之士。李夢陽的同時及稍晚，東南的蘇州產生了許多重要的文人，他們或者

州，王維楨為華州人，恰好返鄉而遇難。

僅成進士並非詞林，如顧璘、歸有光，或者只與翰林院沾上一點關係，如曾為翰林待詔的文徵明，曾為南京翰林孔目的蔡羽，都非翰林正途，¹⁰⁴或者僅僅只具舉人身分，如祝允明（1461-1527）、黃省曾（1490-1540），或者並未入仕，如王寵僅以歲貢入太學，卻都享有全國性的大名，這一現象當然與蘇州文苑先天優越的環境有關，但李夢陽所帶來的文壇固有結構鬆動的影響，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此後，繼前七子而起的復古派領導人李攀龍、王世貞、梁有譽、徐中行、宗臣、吳國倫與處士謝榛（即後七子），除謝榛並未出仕外，其餘分別是嘉靖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九年進士，但皆未入翰林。隆、萬的後起之秀中，三袁與鍾譚也是重要的領袖人物，除了袁宗道曾入翰林，但不久即卒外，他兩個弟弟，袁宏道官至知縣，袁中道功名更薄，鍾惺、譚元春都只有進士知縣的履歷，卻俱能管領風騷，在弘、正以前文章必歸於館閣詞林的時代裡，是完全不可能出現的。

以下，我再依據《明史·藝文志》所著錄的明人文集，作成〈表六〉，用以分析明代個人文集出版的情形，讀者將更明確地看到這次文壇結構變動的全貌。

〈表六〉的左欄是時代分期，依照《明史·藝文志》原書的分期未做改動，這個分期，如果從時間長短來看，並不均等。上欄是著作者身份的分類，我將之分為館閣詞林、一般進士、舉人以下（含未仕者）、無法分類者，共為四類。所謂無法分類，是因為他們的生平事跡不詳，所著文集也找不到。由表中的分析資料發現，在洪武建文時期，出身詞林的比率最高，朱元璋喜歡命人入翰林，而且編修元史也用了許多人，是使比率增高的主因。但是舉人以下或未仕者，以及無法分類的也很多，這是因為開國之初，很多人並未出仕。

在永樂年間，館閣詞林著有個人文集的比率特高，可見詞林甚受重視，洪熙宣德時期因總人數只有二十人，實在太少，比率較無意義。

正統至天順間，館閣詞林與一般進士著有文集的比率逐漸拉近，仍是館閣

104) 進入翰林院的正途為進士一甲，及庶吉士散館選充，二人都是由歲貢經國子監入為翰林院，限於資格，僅能為低階官吏，與正途出身的翰林地位不可並論，但兩人都以此履歷自豪，時人亦以翰林稱之。

表六 《明史藝文志》所收別集作者出身統計表

時代別 / 身分別	館閣詞林		一般進士		舉人以下		無法分類		小計	
洪武、建文	40	33%	34	28%	27	22%	20	17%	121	100%
永樂	33	63%	12	23%	7	13%	0	0%	52	100%
洪熙、宣德	7	35%	10	50%	3	15%	0	0%	20	100%
正統、景泰、天順	19	42%	18	40%	8	18%	0	0%	45	100%
成化、弘治、正德	58	40%	69	48%	18	12%	0	0%	145	100%
嘉靖、隆慶	98	30%	183	56%	47	14%	0	0%	328	100%
萬曆、天啓、崇禎	58	28%	104	51%	43	21%	0	0%	205	100%
合計	313		430		153		20		916	

本表依據《明史·藝文志》，刪略皇帝、僧道、婦女部份及少數重複列舉之處。又，「舉人以下欄」包括未入仕者。無法分類者，因作者身分不詳。

詞林的文集稍多。到了成化正德年間，比率漸漸拉開，詞林出身者比率減少，而一般進士出身者大幅增加，特別是舉人以下者大大增多，就表示詞林的領導地位受到挑戰。這時正是李夢陽崛起之時。到了嘉靖、隆慶之時，詞林比率更少，而一般進士出身者出書的比率大增，幾乎是詞林的兩倍，特別是舉人以下或未仕者的數量多達四十七家，就說明了著作出版的興趣正迅速地向下階層的文人移動。萬曆、天啟、崇禎年間，詞林與一般進士的表現與前期差不多，而舉人以下的比率大大增加，從上述的變化趨勢可以發現，李夢陽崛起的影響，與文壇下層變動的力量，是呈同步發展的。

在前面〈表六〉中，我是把所有的文集，不分卷數大小和重要性，完全以同等地位對待。也許有人會懷疑這樣所得出的比例，未必能真正反映館閣詞林與館閣外人士的著作出版能力，所以我曾經以卷數二十卷以上、三十五卷以上、五十卷以上這三種標準，分別各作了一次比較。¹⁰⁵⁾由於以卷數二十卷以上、三十五卷以上、五十卷以上這三種標準所做的比較結果，其數據都相差

105) 以現存明代文集的作者出身來說，館閣詞林的經濟條件較好，出版的文集往往卷數較多；非館閣詞林者，經濟力量較弱且文集卷數較少的情形，會比較常見。因此，分別卷數二十卷以上、三十五卷以上、五十卷以上這三種標準再予比較，會得到更近真的參考值。

遠，因而，此處僅以五十卷以上者為例〈表七〉：

表七 《明史藝文志》所收別集卷數五十以上部份作者出身統計表

時代別 / 身分別	館閣詞林		一般進士		舉人以下		無法分類		小計	
洪武、建文	3	43%	3	43%	1	14%	0	0%	7	100%
永樂	1	50%	0	0%	1	50%	0	0%	2	100%
洪熙、宣德	1	50%	1	50%	0	0%	0	0%	2	100%
正統、景泰、天順	2	100%	0	0%	0	0%	0	0%	2	100%
成化、弘治、正德	8	47%	8	47%	1	6%	0	0%	17	100%
嘉靖、隆慶	13	46%	13	46%	2	7%	0	0%	28	100%
萬曆、天啓、崇禎	10	34%	14	48%	5	17%	0	0%	29	100%
合計	38		39		10		0		87	

基本上，上項比率，與前面〈表六〉大體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在「成化弘治正德」這個時期，不論是計算二十卷以上、三十五卷以上或五十卷以上的家數，詞林與一般進士的人數幾乎相同。由於詞林人數遠遠不及一般進士，文集數量卻相當，顯示詞林擁有文集的相對比率，遠高於一般進士。而且，表中所呈現的「成化弘治正德」時期一般進士（含舉人）的文集出版數量比詞林還多，也有因為小著作量的作家人數大增的緣故，故館閣詞林仍居主導地位。到了嘉隆時期，非館閣人士合起來比率超過館閣詞林，到了萬曆以後，這項比率更急速拉開，非館閣人士個人文集的著作量大大增加。雖然，前文也提醒過讀者，分析比較時，得再考慮雙方人數的差距。不過，館閣以外人士文集的數量在李夢陽崛起後快速增加的事實，誰也無法否認。

再從質的方面來看，我們所熟知的文壇人物中，李夢陽以前叫得出名字的，像楊士奇、倪謙、程敏政、王直、吳寬、李東陽、王鏊等等，都是由館閣詞林出身。而與李夢陽同稱七子者，只有康海、二王曾經短期入翰林。比李夢陽稍晚的知名文人中，唐順之曾入翰林，而王慎中就沒有，歸有光更是到晚年才取得進士；至於後七子，連考上庶吉士的也沒有；三袁、鍾、譚只有袁宗道一人曾入翰林，可惜早逝了。換言之，李夢陽等人挑起了復古風潮之後，不僅文學的路線起了變化，文壇的領導權也有所改變。許多文學議題上的爭論，都

是館閣之外這些特起的文人在主導，館閣詞林即使想再事振作，也沒有多少人理會，他們的影響力幾乎已經淡出文壇的主流之外，這一點務必非常注意。

這樣的結果，當然不是館閣中人樂意見到的，本文之初引用的張慎言〈何文毅（宗彥）公全集序〉一文，張慎言所看見的，就是館閣詞林與館閣外文人之間的鬥爭。且不談何宗彥、張慎言等人將「館閣體」稱為「臺閣體」，意圖強調館閣的文壇領導地位這件事，諸如焦循、李維楨、袁宗道、錢謙益等人，美化李東陽，強烈批判李夢陽，都不是巧合，他們都是館閣出身，站在捍衛詞林立場發言的。錢謙益還將戰火延伸到後七子，在〈李本寧先生七十敘〉一文說：

謙益於先生，史館後進也。……余又竊聞之於人，先朝文章，盡在館閣。王、李之徒，以館閣相警警，海內靡然從之。先生起而禪王、李之統，豐碑典冊，照耀四裔，文章之柄，乃復歸館閣，其有功於館閣甚大。文章不朽之盛事，必有如韓、歐其人者出而定之，固非後生小子所與知也。¹⁰⁶

李本寧即李維楨，隆慶二年（1568戊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除編修，錢謙益所謂「穆廟戊辰，館選聿隆。」¹⁰⁷便指李氏為首。李維楨不但於隆慶、萬曆初在館閣有重名，所著《大泌山房集》，也享有美譽。錢謙益首先標榜自己是館閣詞林一員的身份，指出王、李（王世貞、李攀龍）以館閣為攻擊對象，到李維楨，才以自己卓越的文章能力，把文壇的領導權奪取回來，復歸館閣。錢氏這種說法，精確地看出了李夢陽以來復古派所造成文壇結構的重大變化。

總之，李夢陽的崛起與館閣的消潛，如果單單就李夢陽個人的成敗來說，那是因為李夢陽的筆力學力過人，又正巧遇上館閣多事之秋，而造成如是的機遇。然而，李夢陽畢竟是明代開國以來第一位不具館閣詞林的身分，而能夠在文學上大開宗派的人，因此，李夢陽等人成功之後，館閣詞林的領導地位就已受到嚴酷的挑戰，館閣雖然仍舊能夠以其內聚力自我尊視，但是風氣已開，古文詞已流行，作詩作文者、出版詩文集者，日以增多，大量的作者希望自顯個性，自

106) 見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36，第1006頁。並參閱簡錦松，《論錢謙益《列傳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文學新論》，（第2期），南華大學，2004年7月，第127-157頁。

107)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51，第1297頁。

闢蹊徑，自成一家，不必選入詞林，也能憑著自己的文學造詣，爭取文壇的領導權。如是而造成正、嘉、隆、萬以來文壇的結構丕變，文學思潮迭興，文學領導勢力不斷重新組合，這一點，正是研究明代文學史必須絕對正視的問題。

5. 結論

綜上所述，本論文可得如下結論：

一、世人習稱之明代「臺閣體」，應正名為「館閣體」，指館閣詞林的文體。館閣詞林是明代文官制度下的實際官僚組織，館閣詞林趨尚的文體，就是「館閣體」。「臺閣體」一詞，是淵源於典故的用語模式，含有增美、夸稱的味道，宜正名為「館閣體」。倘若因為使用習慣的緣故，不便立即更名，亦應認清「臺閣體」與「館閣體」二詞的真實義。

二、明代的館閣詞林，是因翰林選才制度而被動地集合，並不是因為有共同的文學主張而形成文學流派。館閣詞林因其身分確定，地位優越，有良好的由於客觀的因素，館閣詞林基本上師法歐陽修，但由於其傳統精神本在博學，對於古文詞，並無定於一尊的宗主需求。復古派則有鮮明的「引而上之」的學古目標，兩者明顯不同。內聚力，有共同的學習與提倡古文詞的目標，而形成相近的體貌。

三、從實際作品而言，李夢陽與之前的館閣文章，有一望而知的明顯差異，這一點才是李夢陽一派必然走上與館閣詞林殊途的主因。事實上，李夢陽的文章新境，充滿了解放的色彩，不但在當時一新耳目，對晚明重視個性的寫作風氣，也有導源之功。

四、明代中期文壇的變局，不宜以人事的互相攻擊為主調。李夢陽崛起的最大意義在於，他是第一位既非館閣詞林，又非如葉盛等身為臺省長官，卻能夠成為文壇上的領袖。從而激成嘉、萬以來古文詞寫作風氣大開，文集出版的數量急遽增加，文壇結構丕變的氣運，文學史的新局面於焉打開。

參考文獻

- 陳騭, 《南宋館閣錄》, 北京市,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年
- 陳國球, 《明代復古詩論研究》, 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 1990年
- 戴名世, 《戴名世集》, 北京, 中華書局, 1986年
- 顧璘, 《息園存稿·文稿》, 臺北, 文海出版社, 1976年
- 顧清, 《東江家藏集》,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 惠洪, 《石門文字禪》,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 何景明、李淑毅點校, 《何大復集》, 河南,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9年
- 黃宗羲, 《明文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年
- 黃佐, 《翰林記》, 臺北, 藝文印書館, 1971年
- 焦竑, 《國朝獻徵錄》, 臺北, 明文書局, 1991年
- 簡錦松, 《明代文學批評研究》, 臺北, 學生書局, 1987年
- 李林甫, 《唐六典》, 北京, 中華書局, 1992年
- 李東陽, 周寅賓點校, 《李東陽集》, 長沙, 岳麓書社, 1984年
- 李開先, 《李中麓集》, 台南: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年
- 李夢陽, 《空同集》,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 李夢陽, 《空同先生集》, 臺北, 偉文圖書公司, 1976年
- 李攀龍, 《滄溟先生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
- 李賢, 《古穰集》,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 梁儲, 《鬱洲遺稿》,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 劉士驥, 《蟋蟀軒草》, 台南,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年
- 羅玘, 《圭峰集》,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 廖可斌, 《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008年。
- 劉肅, 許德楠、李鼎霞點校, 《大唐新語》, 北京, 中華書局, 1984年
- 倪謙, 《倪文僖公集》,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 歐陽修, 《歐陽修全集》, 臺北, 華正書局, 1975年
- 錢謙益, 《列朝詩集小傳》, 臺北, 世界書局, 1985年

- 錢謙益, 錢曾箋注, 錢仲聯標校, 《牧齋初學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 錢謙益, 《有學集》,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9年
- 譚天星, 《明代內閣政治》,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6年
- 譚元春, 《譚元春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 吳寬, 《匏翁家藏集》,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9年
- 文徵明, 周道振點校: 《文徵明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
- 王鏊, 《震澤集》, 臺北, 世界書局, 1988年
- 王夫之, 《夕堂永日緒論外編》, 臺北, 木鐸出版社, 1982年
- 王九思, 《溪陂集》, 臺北, 偉文圖書公司, 1976年
- 王樵, 《方麓集》,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 王世貞, 《弇州四部稿·續稿》,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 王文才, 《楊慎學譜》,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 徐學聚, 《國朝典彙》, 北京, 書目文獻出版社, 1996年
- 袁宗道, 錢伯城標點, 《白蘇齋類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 袁震宇、劉明今, 《中國文學批評通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
- 楊士奇, 《東里全集·續集》,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 葉暉, 《明代中央文官制度與文學》,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1年。
- 張時徹, 《芝園外集》, 台南縣, 莊嚴文化出版社, 1997年
- 湛若水, 《湛甘泉先生文集》, 台南,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年
- 周如砥, 《青藜館集》, 台南,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7年
- 張廷玉, 《明史》, 北京, 中華書局, 1987年
- 朱保炯,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
- 中央研究院, 《漢籍電子文獻翰典全文檢索系統》, 臺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1984年。網址: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 (檢索日期: 2013.01)

원종례, 明代前後七자의 詩論研究, 서울, 서울대학교대학원 博士論文, 1989年

<Abstract>

On the Reality of the Cabinet Officials in Collections of the Ming Dynasty

Chien, Chin Sung

Regarding literatures of the Ming Dynasty, commentators in the past often compared the style of The Three Yangs' Cabinet Officials to the styles of The school of Chaling-Li Dongyang and of The Seven Sages-Li Mengyang. However, it is inappropriate to exclude the style of Li Dongyang from the style of The Cabinet Officials whose connotation was entirely misunderstood this way.

The present paper compares and contrasts over eight hundred pieces of collected works and observes the different behaviors of works during this period. This survey suggests that the style of The Cabinet Officials should be addressed as the style of The Scholar Officials instead, which is a special style shaped by the cohesion forces of system of Scholar Officials during Ming Dynasty.

Moreover, around the time when Li Mengyang emerged, the works of these two schools appeared to show regular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structure and content, and this phenomenon explain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spute about style between the reversionaries and the scholar offices.

Key words : Ming Dynasty, the Cabinet Officials in Collections, Li Mengyang

투 고 일 : 2013. 05. 17. / 심 사 일 : 2013. 06. 01. ~ 2013. 06. 20. / 게재확정일 : 2013. 06. 23.